



清史論叢

2001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07

1/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清史论丛

2001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 2001 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0

ISBN 7-5043-3747-1

I. 清… II. 中…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885 号

清史论丛 2001 年号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李亚明
封面设计:	李燕平
责任校对:	陈丹桦
监 印:	戴存善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 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747-1/K·93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清史论丛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杨 珍

李世愉

陈祖武

张捷夫

何龄修

高 翔

郭松义

赫治清

主 编 张捷夫

副主编 李世愉(常务)

高 翔

CHINA

目 录

清代北京旗人的莹地与祭田	
——依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刘小萌(1)
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	
——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	定宜庄(20)
清代的无赖层与地方社会·····	陈宝良(44)
清代中国救助朝鲜难船的方法:以闽台地区为中心·····	汤熙勇(65)
清初朝鲜通事考	
——以古尔马浑(郑命寿)为中心·····	杨海英(88)
谢济世散论·····	高翔(107)
顺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汤开建(123)
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	吴伯娅(143)
康熙帝公主下嫁与噶尔丹之战·····	恽丽梅(158)
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质疑·····	王冬芳(167)
“免粮三年”与“薄赋税,均贫富”不是 太平天国的口号·····	姜涛(178)
从东波档看清代澳门的民事诉讼及其审判·····	刘景莲(186)
关于清前期学术思想的争论·····	汪学群(197)
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陈祖武(214)
方苞三礼学论析·····	林存阳(223)
清入关前服饰制度的建立·····	严勇(234)
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	关嘉禄(247)

CHINA

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

——依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刘小萌

旗人的土地问题,是以往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旗地形态相当复杂,按性质分,有官庄、王庄、一般旗地之别;按来源分,有老圈、价买、典置、赏赐、置换、回赎、转让、继承等之别;按用途分,又有农庄、茔地、祭田之别。其中,茔地和祭田,作为安葬和祭祀先祖的用地,彼此关系密切,在以往的旗地研究中又很少专门的探讨,^①故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主要考察两个问题:第一,茔地和祭田的来源;第二,茔地和祭田的制度。

茔地和祭田的来源

满族人自清初起,已深深濡染汉人的孝道观。尊祖先、重丧葬,成为风靡全社会的一种时尚。厚葬必先立坟茔,尊祖需设祭田。《正黄旗满洲乌雅氏祭田记》说:“建碑以表先茔,常存报本之意,置田以备祭祀,足徵追远之诚。”表述的也就是“慎终追远”之意。^②茔地与祭田,作为旗人土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七种:

来源之一,老圈地

入关初期,旗人计丁授田,所授土地均圈自汉民,习称“圈地”(后称“老圈地”)。旗人最初的茔地、祭田,多设置在自家的圈地内。康熙十七年(1678年)旗人安氏茔地碑载:

安氏佳城者,安氏所建之祖茔也。安氏世家长白,龙兴朗公(按,原文如此),公讳翁

① 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81辑,1997年版)第三章《皇族的公产》的第三、四节,主要依据档案,对皇族祭田进行了研究。金启琮《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部分《园寝附近的满族》,对王公园寝的规模制度有比较详实的说明。

② 碑在北京房山区北羊头岗。刻于道光十四年四月。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册,第122页。

格清，旧以赵为姓，从龙之始，外同驰骋，内侍帷幄，历有奇勋……奄有四方，定鼎燕京，斂戈释马之日……遂请得畿西良邑之鲁村，膏壤近百顷，既而庶事乃备。公又怡然而喜曰：吾事竣，心则泰然而安矣。思古人每以地每以官以事而为氏，吾赞言辽安中土安，今身家亦安，是貽子孙以安，盍以安为氏？乃令举族咸以安为姓，而命名少子曰安泰。公又恍然曰：吾无不安，独先人之墓远在一方，不能伏口祭饗何心口。然吾老，口无口矣，此则子孙之责也。后以寿而卒……嗣君三人，皆歧嶷俊伟，或供职内府，或任事王田，绍先人之业而光大之。遂于庄西之近土竟获牛眠而建斯茔焉。^①

翁格清一家原籍长白，也就是明辽东边外的满族故地，后来随着不断壮大的后金（清）政权，先进入辽沈，接着入关并安置在京西良乡的鲁村，遂得“膏壤近百顷”。清朝入关，对八旗官兵“莫不授以土田，俾聚家室，长子孙”，授田的标准是每丁六晌（每晌六亩，合三十六亩）。按此方法授田，显然对占有众多奴仆壮丁的八旗贵族官员最为有利，因为“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晌。”^② 翁格清受田百顷（即一万亩），说明他家所属的壮丁至少有二百多人，应该是旗人中大户了。而众多壮丁和良田的占有，与他“从龙之始，外同驰骋，内侍帷幄，历有奇勋”的业绩又是分不开的。

翁格清原汉姓为赵，或即满洲觉罗姓，定居京畿后，因希望后世子孙代代平安，乃改汉姓为安，又命名少子曰安泰。这虽是濡染汉习，以吉祥字给子孙命名的结果，而满人改姓命名的随意性，据此也可见一斑。

旗人“从龙入关”以后，或安置北京内城，或分屯畿辅各县。前者为城居旗人，后者为屯居旗人。翁格清功成志满，退居庄田，当属“屯居旗人”之类。但从他三个儿子“或供职内府，或任事王田”的记载看，八旗子弟或当兵出仕，或在家掌管农事，本没有截然的界限，只是各种机缘和个人选择的结果。

旗人入居北京后，祖坟均在关外，路远山长，祭扫祖茔成为许多旗人终生梦牵魂绕而难以成真的事。康熙帝在平定全国后，特意网开一面，准许在京旗人去奉天设庄守墓，凡是退回所分畿辅旗地者，可以在奉天如数拨给熟地。但绝大多数旗人显然更愿意留居北京，虽然他们将辽东视作原籍，但真正有条件死后归葬的却寥若晨星，现实的选择只有在京郊设立新茔。翁格清就是如此，他选定的茔地就在良乡鲁村西的圈地上。

清朝入关初，旗人世家望族广占田土，最初的茔地多建于自家的圈地。马佳氏是清代满族望族之一，与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纳喇、董鄂、辉发、乌拉、伊尔根觉罗诸氏并称“八大家”，曾涌现赫东额、克库噶哈、雅希禅、图海、马尔赛、和起、升寅、宝琳、绍英等名将、名臣。该族族大支繁，早在入关前已析分为一系列宗支，各有茔地。开国名将雅希禅，天命年间卒，

① 碑在北京房山区良乡南鲁村。张凤口撰。载《汇编》第63册，第122页。

② 《清世祖实录》第127卷，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第15页上。

葬在盛京(沈阳)东北曾家屯。至其孙纳新、洪海,始随清世祖入关,设新茔于北京安定门外东北十二里关家庄地方,奉雅希禅为始葬祖。茔地方圆二百余亩,系老圈地。^①

镶白旗汉军高其位、高其佩兄弟,都是康、雍之际的显宦。其位官至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佩官至刑部侍郎兼正红旗汉军都统。后者还以指头画知名当世。他们的第一世祖高友,明万历年间自山东莱州府高密县草桥村迁居辽东的铁岭卫,其后人于清初入旗,祖坟在沈阳新城堡。及第四世高尚仁、高尚义等“从龙入关”后,设坟茔于广渠门外老虎洞圈地。到第五世高天爵时,又在左安门外周家庄燕儿窝圈地设立新茔。以后随着子嗣繁衍,茔地也不断增置,然多为价买,已非老圈旗地。^②

另据档案记载: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将自己名下圈地一块,坐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作为后辈公中祭田,每年收取租银九十六两。^③ 厢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一项,每年收取租银八十两,除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十房公分。^④ 这些记载说明:除茔地外,旗人的祭田也往往源于圈地。^⑤

清开国勋臣、汉军旗人范文程卒于康熙五年(1666年),其祖茔原在关外,本人歿后则安葬在北京怀柔县城北红螺山下卢庄村西的新茔。^⑥ 范家祭田也相应分为两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范文程嫡裔重立的《范公(文程)祠墓碑记》,碑阳刻祠堂规制图、关东(即辽东)熊岳地方祭田义产清单,碑阴刻熊岳方位图。清单上载明:范氏在熊岳的祭田义产有六百晌,每百晌地设壮丁十名,分属都统、少保、司马、勋爵、司农、兼山等六房。后来又购置地十六顷一十六亩;房一百五十七间。^⑦ 其中,六百晌祭田义产都是红册地(即入关前圈占的旗地)。可见,范氏祭田包括圈地和购置地,而圈地是主要的部分。资料又显示:祭田只占范氏全部红册地中很少的一部分。^⑧ 不过,到了晚清,范府的实力亦如大清王朝,走过了“烈火油烹、繁花似锦”的好时光。耕种祭田的壮丁不断逃亡,^⑨ 范府只好将他们遗下的土地招民佃种,收取地租。

① 马熙运编著《马佳氏宗谱文献汇编》乙编第6卷,1995年铅印本第514~515页《北京雅希禅墓》。

②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镶白旗汉军高氏家乘》,写本。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来文》,《福伦等亲供事》,咸丰五年三月。

④ 《宗人府来文》,《载钦等供事》,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⑤ 参见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第135、139页,载有宗室贵族祭田源于老圈地的事实。

⑥ 李蔚《范文肃公墓志铭》,载钱仪吉《碑传集》第1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页。

⑦ 《范公(文程)祠墓碑记》,刻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碑在北京怀柔县城北卢村西。载《汇编》第71册,第95页。

⑧ 见《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范宅老地账》、《范府祠堂地亩和房间册》,俱载中国科学院民族所编《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1963年铅印本。

⑨ 道光十年十一月《范府祠堂地亩和房间册》。

来源之二,购置地

顺治、康熙年间,旗地来源单一,决定了旗人的莹地、祭田主要设置于自家圈地,以后旗地来源日呈多样,购置地随之构成莹地、祭田的重要来源。购置地,也就是价买得来的土地。

在莹地的选定上,“风水”的好坏,逐渐成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购置地增加的一个因素。风水,又叫堪舆,堪指天道,舆指地道。综合起来,堪舆是指地理形势和自然环境。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求得人和天地、自然的和谐,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便是讲究风水的宗旨。具体到选择莹地,必须考虑的要素包括“气”(取吉气,避煞气)、龙(山势)、穴(穴地)、砂(穴地前后左右回护的山峰)、水(与龙、穴、砂相关的流水或静水)以及位向,只有在这些方面都符合规矩,才称得上是风水宝地。但风水好的地点未必在自家老圈地内,在这种情况下,购置就成为添设新莹的重要手段。

另外,子孙后代不断繁衍分析,祖莹内余地逐渐减少,也促使旗人寻找新的来源。《德敏墓碑志》说:“惟我祖莹限于地狭,难以安葬,余无可如何,图维数载,方卜葬于东直门外东坝之北,另造新莹,立向子午,兼癸丁三分。周围植树三百余株,置地二顷三十五亩五分。”^①德敏隶满洲镶白旗,乾隆九年(1744年)、二十六年(1761年)两任荆州将军,第二次任职不久后歿,诰封光禄大夫。他请风水先生寻访数载,才在东直门外东坝之北选定新莹。所谓“置地”,也就是购地。

又元福撰《乌雅氏祭田记》载:乌雅氏世隶正黄旗满洲,族大支繁,原难备载。其中元福一支始祖名翁握春,例赠光禄大夫,高祖名莫尔欢,官员外郎;曾祖名明安图,授职分部主事。^②自始祖以至高、曾三代,俱葬于京北大屯。祖名天文,隐居未仕,歿后葬于房山县北羊头冈村南。元福父亲名常明,生兄弟二人,长即元福,弟名元禄。两兄弟“幼而读书,长而俱入国学”。及年长,元福随父亲在乡料理家务,元禄则在京应事。元福生子四人,元禄生子五,其时家道日隆,人丁亦盛,孰知不数年间,元福之父、弟以及三子相继亡故。这给元福的心理造成沉重打击。碑文中还提到,常明死后没有随其父天文葬在房山县北羊头冈村,而是回葬京北大屯的祖莹,“以守先人之墓为念”。

常明生前以祖莹狭隘,曾命元福在祖莹之北另择新地设莹,并将设立祭田的大事托付给他。而当元福撰写此碑时,距父亲辞世已过十数年,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垂垂老矣,“忆吾父属吾之言,有不能不急为之图者”。于是“就吾父与吾所置地亩,在羊头冈者,旗地四顷、民

① 碑刻于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盛昱集录《雪履寻碑录》第14卷,引自金毓黻《辽海丛书》第9集,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3046页。

② 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30卷《哈达地方吴雅氏》(辽沈书社1989年影印本):翁鄂春(即翁握春)原任佐领,父名萨穆哈,伯名额柏根,为开国勋臣,创业名家,子弟累世簪纓。额柏根之孙魏武的女儿为康熙帝孝恭皇后,即雍正帝母,故雍正年间其族人更是贵幸无比。

地四顷六十亩,并有羊头冈所居房屋一所,共为祭田”。元福设立的祭田在祖父天文墓地所在的房山县北羊头冈村,都是置买的旗地和民地,共计八顷六十亩,还有房屋一所。为此,他亲撰《祭田文》,镌碑树立。谆谆教导后嗣:“是祭田也,是祖、父艰难辛苦不易得之者也,是祖、父夙夜矜持惟恐失之者也。尔子孙其之克勤克俭勿怠勿荒,尚其遵祖训,听父言,勿以其为虚文故事也。”^①

最迟从清代中叶起,置买已成为王公设置园寝地的重要手段。以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一系为例,先后设立了四处园寝,即:密云县董格庄荣纯亲王府园寝、丰台区大灰厂荣恪郡王绵亿园寝、房山县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海淀区马连湾载钧贝子园寝。这四处园寝,除一处是官府代购外,其余三处都是置换或购买的。^②

醇亲王奕譞,是晚清政坛上一言九鼎的人物。他是道光帝第七子,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皇后胞妹,正因为有了这层至亲关系,他先为慈禧皇后篡权“垂帘听政”出了大力,后又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故几十年间宠荣不衰。在慈禧太后的意旨下,醇王一家竟出了两个皇帝(即光绪帝和宣统帝),贵显无比。即便有这般权势,醇王的园寝也是通过置买得来。

醇王为了选择风水宝地,颇费心思。事成之后,他将置买园寝的经过赋诗刻石说:

中情犹豫逐时添,卜吉迟迟岁月淹,立异漫夸三识慧,决疑须协二人占,心通柳暗苍明境,语绝瓜田李下嫌(原注:妙高峰风水经李尧民看定本无疑义,旋有称不可用者,复倩萧山叶绣圃来视,始知皆属子虚)分付舆徒宜便了,朴诚忠信喜相兼(命七品首领太监范常喜、护军校色克图董厥事,一切章程均极周妥,山田互易,公平售买,亦毫无抑勒沾染,虽由余指画,伊等实能恪遵)。戊辰嘉平年口月作并书勒石。^③

戊辰年即同治七年(1868年),醇王是在这年秋选定妙高峰东麓作为茔地的(在今北京海淀区北安河乡妙高峰)。此地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有唐代法云寺遗址。金章宗时,此处又是西山八院之一的香水院。当时他正在蔚秀园养病,某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该庙距妙高峰不过十里之遥,是醇王旧仆、太监王照禄、王正光修建的。他们带着风水先生李唐(字尧民)和醇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认为该处“点穴最佳”,醇王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④但不久就有人谓此处不可用,于是醇王又请叶绣圃再视,叶以为“不可用”一说“皆属子虚”,使醇王最终拿定主意,在此修筑园寝。醇王诗追述了选定吉壤的曲折过程,并对

① 元福撰《正黄旗满洲乌雅氏祭田记》。刻于道光十四年四月。碑在北京房山区北羊头冈。载《汇编》第80册,第55页。

② 金启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86页。

③ 《醇王园寝诗刻》,刻于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碑在北京海淀区北安河宏伟村。载《汇编》第83册,第151页。

④ 奕譞《退潜别墅存稿》卷1。

“山田互易,公平售买,亦毫无抑勒沾染”的做法表示满意。

为了帮助醇王置买茔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还拨给了白银五万两。对此他不禁感激涕零,特别赋诗一首,刻碑立于园寝,作为纪念。诗曰:“深公祇解巢由隐,支叟无由谢俗缘,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原注: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五万两)。^①慈禧太后的恩赐,无非是对醇王的笼络。可见,在所谓“公平交易”的背后,体现的依旧是宗室王公的巨大特权。这应是王公贵族置买地与普通旗人置买地的基本区别。

来源之三,置换地

在茔地的多种来源中,置换地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所谓“置换地”,也就是用自家土地换来的茔地。旗人戴全德撰《北山墓地记》说:他家祖坟在顺义县彰禧庄,是老圈地,自高高祖以下已安葬五代,因无隙地,只好另择新茔。选择新茔的标准有二,一是距祖坟不宜太远:恐离祖墓太远,子孙祭扫时“顾其近宗而遗其远祖,失水源木本之义”;二是风水要好,必须是堪舆家认定的“吉地”。最后选定的新茔地在昌平州东(今怀柔县城西东坟村),距祖坟三十五里,便于岁时祭祀,子孙省视,且地方偏僻,价值不昂。

新茔地共十一顷四十八亩八分三厘,其中阴宅占地五十三亩三分三厘,阳宅占地五十七亩,家庙安云观占地十一亩九分三厘。以六顷作为看坟人的贍养田,其余部分招人耕种。在上述茔地中,有六顷余是戴全德用俸银购买的,另外有五顷官田,则是遵例用比它多三倍的自置地交换的。在设置新茔的同时还拨出通州大兴庄地十三顷六十九亩,立为祭田。^②

按清制:“官员人等坟茔不能容葬者,准其兑换官地为茔。”兑换条件,一是必须按一比三的比例,即“每官地一亩给地三亩,准其兑换”,二是交换后的土地收益要高出原来的土地。这成为八旗官员置换官地为茔地的通例,有关交换事件不仅载在碑文,也屡见于档案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正白旗满洲工部员外郎清福向内务府会计司呈称:用自置东直门外驼方营道南地五十亩、孙河马连店地一顷,换取驼方营道北内务府奉宸苑所属花匠郑名荣名下当差地五十亩,作为茔地。征得郑名荣同意后,会计司以清福所请符合“凡更换坟地者,每官地一亩,给地三亩交换”之例,准其更换地亩,并移咨正白旗满洲都统、奉宸院,派人带领双方当事人将更换地亩互相明白指交,记入各自档案。^③

有的旗人为了征得对方同意,不惜用高出对方三倍的土地兑换。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初六日掌仪司呈稿《为咨行事》载称:镶白旗满洲道崇福因“祖坟狭隘,不能容葬”,呈请将

① 《醇王园寝诗刻》。

② 乾隆五十六年戴全德撰,嘉庆三年五月十三日铁保正书。碑在北京怀柔县城西东坟村。载《汇编》第77册,第35页。

③ 乾隆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会计司呈稿《以更换茔地事》,《清代的旗地》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本,第1242~1243页。

红契自置坐落顺义县西后桑园村地方土地二顷一十亩内,拨出一顷四十四亩,遵照三亩兑换官地一亩之例,兑换掌仪司所属果园壮丁徐进荣名下坐落广渠门外燕窝村官地四十八亩为莹,并情愿将契内余地六十六亩一并给徐进荣名下添补当差。道崇福的二顷一十亩地,共取租钱五十七千五百五十文,比徐进荣四十八亩地的地租多出了十九千一百五十文,因“比官地租息,有盈无辍[续]”,掌仪司呈准了这起交易。^①

嘉庆二年(1797年),绵八爷贝勒府用本府坐落通州台户村地三顷二十七亩兑换阜成门外八里庄南边核桃园地方内务府花匠马平的一顷零九亩地。贝勒府所指地比马平的官地整多三倍,每年取租钱一百三十吊八百文,比马平的官地地租还多出八百文。经内务府核准换给。^②这又说明,即便是王公贵族,兑换莹地时也必须遵守有关规定。

清中叶以降,因数十万旗人长期聚居京城,使越来越多的人遇到“祖莹因年久地窄,不能容葬”的问题。另辟新莹,成为他们朝思暮想的一桩心事。近郊寻找不到,只好到远郊寻找,到后来,连在远郊或畿辅各县兑换莹地也成为一件难事。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正黄旗满洲贡生灰瑞,指自置坐落新城县旗地四顷一十亩,每年取租钱一百零二千,兑换该县上清河村香灯官地一顷三十六亩余,每年官征租银二十二两二钱余,作为莹地。寻经内务府查清,灰瑞所指香灯地,已经正黄旗副催长福宁呈递兑换为莹。灰瑞的要求自然落空。^③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些旗人兑换莹地,首先注重的是“风水”的好坏,至于地价的高低、租钱的多少,考虑倒在其次,所以才会出现不计较地价和收益的现象。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官府之所以规定兑换地必须按三比一的比例,也是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到损害。顺理成章的推理是:旗人用于兑换官地的土地,通常都是硃瘠薄收或者地理偏远、难以管理的土地。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三比一的兑换比例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除官地外,旗人兑换民地为莹有时也参照三比一的比例。北京西郊恩济庄关帝庙,原置有民地一段,在八宝庄村西,计地五十二亩,租银二十六两。咸丰三年(1853年)有旗人崇宅欲兑换此地为莹,遂与关帝庙住持议定:换出双槐树村北地五段共计一顷六十三亩,每年取租钱一百八十吊。崇宅换出地约当换入地的三倍,收益则相当换入地的六倍。^④

在宗室王公中,奕绘贝勒的园寝是典型的置换地。他看中的园寝在今房山县大房山之东的大南峪,明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曾为宝珠禅师王能贵建天台寺于峪中,从此,大南峪成为天台寺产。至清道光年间,天台寺早已衰败,四面地界又受到豪强侵蚀。道光十四年(1834年),奕绘方袭多罗贝勒,派府员求访莹地,爱天台寺山林幽静,命二等侍卫阿禅泰用府中采育(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地两千亩(多于天台寺地三倍有余)与寺僧商换得之。奕绘雅

① 《清代的旗地》下册,第1243~1244页。

② 嘉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载《清代的旗地》下册,第1245~1246页。

③ 嘉庆三年三月初九日《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载《清代的旗地》下册,第1246页。

④ 《关帝庙茶棚碑》,咸丰三年二月刻。载《汇编》第82册,第58页。

好文学，诗词文章皆称名当世，亲书易地诗券交给寺僧，存于上院法源寺，作为交易的契据。^① 其诗曰：

永定河之西，大房山之东，是为大南谷，建寺万历中，环山多膏腴，寺僧颇素丰，其木宜柿栗，桃花路难通。迄今二百载，传徒懦以懦，皇庄向来横，况值州县慵，乃献法源寺，以势压彼凶。按碑问疆界，已非昔日封，转求大檀越，良田易青峰。

谷东果树林，官惟半顷藪，其余皆僧物，方家占来久，久则难变正，况埋祖父母，葬妻夺人墓，斯心汝安否？二顷我不需，其余僧不守，不守其弃诸，斯可为我有。我有采育田，每每二千亩，三倍于南谷，长老或肯受，与僧立诗券，贞珉建东阜。

东阜建碑亭，大书刻我诗，我诗胜券契，券契多假为。一为圣恩重，使我子孙知。一为寺僧弱，恐我子孙欺。一为土豪横，虑我子孙痴。南谷界已定，万世不可移，采育田已舍，万世不可追，此诗之墨草，法源实藏之，藏之若符契，文句同吾碑（下略）。^②

易地诗券中“南谷”的“谷”即“峪”字。诗中追述了天台寺的历史：二百年来，寺僧懦弱，常受到皇庄势力的压迫，州县衙门却不为寺僧做主，僧众无奈，只好将本寺投献京城名刹法源寺（法源寺在北京菜市口西南胡同之西，唐名悯忠寺，明改景福寺。清雍正九年重修，赐额法源寺）。希望借助该寺威势抗拒豪强欺压，但收效甚微。按旧碑所载查核寺庙四至，早已不是昔日疆界。最后，只好把寺庙近地换给“大檀越”（施主）奕绘，以减少损失。奕绘诗还记载了自己用采育（今大兴县采育）二千亩地与寺僧交换南峪地作为园寝的经过。为了永久保存，他又建碑亭于园寝东坡，镌诗券碑即“买山缘起碑”于亭中（及奕绘歿，其长子载钧以该碑不符园寝制度，撤去）。

奕绘易地成交后，为修园寝向户部预支十年俸银二万七千两，时价值官钱三千三百万，分作二十年扣还。他在《借俸纪恩志愧诗》中说：“圣恩许借买山钱，南峪深宜作墓田，贝勒葬妻容请地，小民乏食敢呼天，度支预领三千万，经费先亏二十年，世禄悠悠愧无补，勉将家学继前贤。”^③ 时奕绘嫡妻贺舍里妙华已歿，暂厝于房山县大灰厂奕恪郡王园寝，故诗中说：“葬妻容请地。”这新的园寝，就是南峪。奕绘因预借了俸银，又联想到平民百姓的贫乏，不免心有愧作。

实际情况是，立此园寝后仅四年（即道光十八年七月），奕绘就病逝了，当时寝工犹未竣，馆阁庵舍，尚未彩饰。预借的俸银如何扣还，自然也就成了问题。不管怎么说，整整十年的俸银被提前预支，如此经济特权，也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享有。

① 金启琮《大南峪绘贝勒园寝》，载《京华古迹寻踪》，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② 奕绘《明善堂文集》第7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90页。

③ 同上书，第7卷，第288页。

来源之四,回赎地

乾隆年间,清政府鉴于畿辅地方大批旗地被民人典买,严重影响旗人生计,先后四次回赎“民典”旗地 18976 顷。一些旗人将回赎的旗地作为茔地、祭田,以期永久保存。丰升额之妻赵佳氏《祭田碑记》说:乾隆八年(1743 年),朝廷特赐阿里衮(即丰升额之父)滦州地二十四顷七十亩、土房十二间半。阿里衮历官外任,家务荒疏,竟被原业主盗典于民人。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始经查出,遵奉部文,代交典价五百两,赎回管业。四十五年(1780 年)因聘福晋奁费无资,将此地指借官银二千两,每岁息银三百两。后因息银拖欠,四房公议,将此地归于长房,听其售价,以缴官项,立结存照。赵佳氏念及丈夫丰升额已逝,家业凋零,囊无余物,又不愿将此地委之他姓,遂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始得了结二千三百两的官债。^①

阿里衮,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朝历仕总管内务府大臣、湖广、两广等处总督,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缅甸之役卒于军,谥襄壮,祀贤良祠。后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他有子四人,即赵佳氏碑文中提到的“四房”,长房即赵佳氏之夫丰升额,以下三房依次为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丰升额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四十一年(1776 年)平定金川立大功,加封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四十二年卒,赐太子太保,谥诚武。^② 丰升额死后,家境衰落,赵佳氏为了保住赎回的祭田,不得不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才算了结官债。可见,即便是世家大族,要长久保有祖辈留下的茔地、祭田,也并非易事。这正是赵佳氏立祭田碑的用意所在。

《庆安茔地碑》也提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先人孙尔松阿、嵩噶礼、蟒古赉将“前岁赎回祖茔明堂地一顷二十三亩以存公中,每岁所获租银以备修理坟茔之资。”^③ 除北京外,在关外旗人中,同样存在将回赎地立为祭田的现象。^④

回赎地虽然不构成茔地、祭田的主要来源,它的存在却凸显了民人侵蚀旗地现象的严重。一些旗人为了防止回赎地再度流失,往往刻碑存记。碑文除谆谆叮嘱后嗣谨守家业外,还详细开载土地段数、亩数、四至。几代以后,碑文逐渐涣泐不清,后世子孙还要重刻碑文,“以垂久远”。如上引《庆安茔地碑》,前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先人孙尔松阿、嵩噶礼、蟒古赉所撰旧碑文,后载嘉庆七年(1802 年)诸孙魁顺、来仪、来成、爱申禄、爱申诚、爱申明、爱申达新刻碑文。新刻碑文重申:“今恐世远年湮,抑或后世子孙及取租人等或典或售以至指

① 《赵佳氏祭田碑记》,刻于乾隆五十五年。盛昱辑录《雪履寻碑录》第 14 卷,收入金毓黻《辽海丛书》第 9 集第 3054 页。

② 《清史稿》第 313 卷,中华书局 1977 年标点本第 35 册第 10675 页,阿里衮、丰升额本传。

③ 《庆安茔地碑》,刻于嘉庆七年。盛昱集录《雪履寻碑录》第 15 卷,收入金毓黻《辽海丛书》第 9 集,第 3058 页。

④ 《马佳氏宗谱文献汇编》乙编第 7 卷,第 535 页《马佳氏宗祠碑文》。

地借贷,不顾先灵,许看守坟墓之人来禀,众人会同秉公办理,毫不姑容。”然而晚清以降,越来越多的中下层旗人生计凋零,莹地祭田或典或卖,厚葬与祭祖的习俗随之式微。

来源之五,遗留地

遗留地,指祖先分产时预留的公共用地,其来源实际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老圈地、置买地、置换地,也有回赎地。在大家族中,若干家支(房)通常保留一块祖遗的公有莹地和祭田,祭田的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厢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六份,另外留出祭田地三顷七十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一百吊,收存以备修理坟墓,每年三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六房子孙还要各拿出七吊二百文。^①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正蓝旗宗室福伦。其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生前,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墓时,将坐落在滦州李福庄的一顷老圈地作为后辈公中祭田,每年收租银九十六两,至五世祖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墓一处。于是将租银分作两份,用为两处坟墓祭祀费用,并分派两房轮流管理。^②在档案中,还有十房子孙共同拥有一块“祖遗老圈地”作为祭田的记载。^③随着世系绵延,家支(房)分析增多,围绕祖遗地产生的矛盾也往往愈演愈烈。因此,在八旗贵族中,关于祖遗地的诉讼案屡见不鲜。

富裕族人的捐赠,也是遗留地的一个重要来源。^④

来源之六,恩赐地

恩赐地,即最高统治者以朝廷的名义,将某片国有地直接划归亡故的功臣作为莹地或祭田,以示褒奖。这种做法始见于关外时期。沈阳马佳氏《宗祠碑文》记载:克库噶哈,为清初名将,晋封男爵,及入关定鼎,留守陪都(沈阳),以战伤逝世,“赐葬奉天大西边门外南孤家子地方,四时派员致祭,并赐祭田一百五十亩,以示酬庸”。其第四子农岱逝后,亦葬于此。大西边门又称怀远门,南孤家子地方位于今沈阳市大西路二经街一带。这片莹地是马佳氏在关外的祖莹之一。^⑤

清廷入关以后,对八旗贵族赏庸酬功,继续采用赐予莹地或祭田的办法。康熙四年(1665年),镶黄旗汉军人、原大学士、兵部尚书、五省经略洪承畴死。清廷念其在招抚江南、

① 《宗人府来文》,《明善泰呈文》嘉庆十七年八月。

② 《宗人府来文》,《福伦等呈文》咸丰五年三月。

③ 《宗人府来文》,《载钦等口供》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④ 东北满族家谱中有关记载,可以参考。见《吉林他塔拉氏家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专图呢吗察氏族谱》,载《满族家谱选编》(1),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⑤ 《马佳氏宗谱文献汇编》甲编第4卷,第35页;参见同书第489页《赐祭赐祭田》,第515页《马家坟与马家祠堂》。